

外来的新文学

——以晚年周作人与香港文学的关系为例观察

雷启立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

内容提要：本文以晚年周作人与香港文学之间所发生的关系为例，检讨了近二十年来关于香港文学、南来作家研究以及几种不同取向的香港文学史书写，指出，几种价值趋向迥然不同的香港文学史的书写背后所共享的是同样“外来”的新文学观念，而在不同的地域文学书写及其对某种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那些“当然”的问题预设、知识阉限和思想方法上二元对立的“中心”与“去中心”观念合谋了我们今天的困境。

关键词：香港文学 晚年周作人 身份认同 文学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关于香港文学的研究和讨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的十几年间，曾经盛极一时。在大陆内部，各种与之相关的文学研究系所相继成立，报刊上关于香港文学研究的文章纷纷出现，大批与港台有涉的文学研究项目启动，一时之间，用文学评论家黄子平的话说，港台文学研究的“形势太好不是小好”¹。个中的原因其实也非常清楚：因为文学以及文学史书写作为“重现”或“抗拒”某种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也因此，当在一九九七年前后，香港文学研究的成果也很有些斐然。²时间已经标示了研究的指向，“统一”和“回归”是其隐含的目的和主题：香港文学何时、怎样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成为研究课题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研究者们讨论香港文学的个性特征，清理香港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作品、人物、事件，评说香港文学的成就与不足，书写着他们笔下的香港文学史。在他们先在的概念和知识背景里，香港文学是从属于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发生在香港。与此同时，在香港本地，也有相当多的关于香港文学、文化研究的计划和项目展开，他们有感于1997的来临，以香港本土的在地诉求质疑前述种种关于香港文学及因“国家论述”而转写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展开他们关于香港文学、文化暧昧复杂的感情。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趋向的关于香港文学史的讨论，仍然是以五四新文学兴起的所谓“现代”为皈依的，那么，当时间又过去快十年了，香港文学研究的热潮及其成为热潮的原因都早已消散，作为呈现不同共同体中介的香港文学讨论也该归真返璞了——虽然，所谓“纯文学”大抵也是在某种理念下建构的结果。我们的问题在于，对于香港文学而言，这一个“现代”文学的几种不同的写法还有什么意义？“回归文学本身”——回到香港文学发生的历史中去，我们或许能看到它背后所暗含的另外的问题。

对于今天比较流行的文学观念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学为肇始的。五四时期所致力启蒙运动，所标榜的自由、民主，所展开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尤其是其个性觉醒的原则、对个性的张扬，更标示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界限，也建立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精神传统的内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是对五四精神不同的理解、利用和演绎的

历史，无论是原来的书写还是后来的重写都是如此。³一代学人书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起点和标尺就以他们各自对五四的不同理解而建立。他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他们当然地以这样的眼光去观察、审视作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的历史就此命定了。于是，在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格局里，大同小异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香港文学都少不得一个“新文学”的概念：1917年的文学革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香港新文学的萌芽和发展……如此依例写来。也因此，1927年鲁迅的香港讲演理所当然地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新文学”的产生不是香港文学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因为它在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里的重要发生，被安放在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香港文学头上的。“新文学”是言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石，它也就成为了言说二十世纪香港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然而，香港本土作家吕伦关于香港文学的回忆却从另一方面展开：“‘新文化’是不受欢迎的。‘五四’运动给予香港社会的影响，似乎只有‘抵制日本货’的概念，‘文学革命’这一面的意义，却没有能够在这个封建思想的坚强堡垒里面发生什么作用。那时候，头脑顽固的人不但反对白话文，简直也否定白话文是中国正统文字。这些人在教育上提倡‘尊师重教’和攻读四书、五经以保存‘国粹’，看见有人用白话文写什么，便要摇头叹息‘国粹沦亡’，对于孔圣人简直是‘大逆不道’。”⁴这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香港当时的真实状况：当内地在进行文学革命，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香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还与此没有关系。因为在那时已经有了几十万人口的香港，接受中文教育的只有二三万人。旧式的私塾讲的是四书五经，新式的学校多由政府或教会兴办，以英文教学为主，中文只是副修课目。那些“抱着买办阶级思想传统的人”，“鼓励儿女去读外国文，目的是好让儿女将来容易找一份‘洋打工’。”⁵在这样的情形下，那“新文学”如何可能发生和发展呢？甚至到了1927年2月，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鲁迅以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到香港演讲，香港文坛依旧“颇冷落，文学艺术活动如万籁无声”⁶。因此，鲁迅到香港演讲的“影响力可能很深远，但在当时来说，却不是立即可以引发出火花”⁷。香港仍然“有相当浓厚的保守成分，很难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些支持新思想的人，多只由青年吸收一些新思想。由于年青人不一定有丰厚的学识，所以也不能与中国大陆真正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接上。”⁸可见，新文学与那个时期的香港的距离还很遥远。但在后来的相当多的香港文学研究者看来，那个时期的新文学与香港的没有关系、距离遥远也是一种关系。甚至在某些学者的意念里，当新文学在大陆生长出来的同时，它肯定也在香港孕育和生长，如果不是这样，那也只是它还没有出土或者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决不至于无的。所以章节安排是一定要有的，至于里面有没有东西可写，写些什么，那是另一回事。而且，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文学上的大陆中心观念甚至在极力主张建立香港文学观念，回归香港文学自身，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中间力量的优秀学者，如黄继持、郑树森、卢玮銮等先生身上同样存在——虽然他们注重历史真实，研究态度严谨。他们并没有编写出正式的文学史，甚至卢玮銮（小思）先生坚决认为“短期内不宜编写香港文学史”——因为“香港文学这门研究仍十分稚嫩，既无充足的第一手数据，甚至连一个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记都还没有，就急于编写《香港文学史》，是不负责任的事情。”⁹但从他们整理的《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27～1941）、编写的《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甚至从他们所编选的香港小说、新诗、散文选看，他们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所关心的问题，所体现的取舍与标准，无论是注重考虑其历史地位还是注重作品的审美因素，那背后仍旧是以五四新文学（精英文学）作为基础的¹⁰。因为“新文学的持续影响之一，就是为现代书面语的形成创造规范、条件和习惯，进而形成一种‘普遍语言’，一种有利于社会认同、国族认同的‘普通话’。”¹¹因此，需要追问的是，香港文学是不是就是香港“普通话”的“新文学”？非常显然，这些文学叙述，无论是向“北”（左？）的还是向“南”（右？）的，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意识作祟的结果，那潜在的知识背景和由此

料的冷饭，与他在《新民报晚刊》、《羊城晚报》等内地报刊上发表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从内容上说，都无关鸿旨。但周作人却由此多了一个“拾芝麻”¹⁸的地方，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周作人对周围的气候渐渐开始适应，对香港与内地媒体的不同渐渐有了一些了解，他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在写给香港报刊的文章，尤其是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脑子里“那种与二三十年代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东西似乎苏醒了”，臧否人物，借流言谈时政。这些“苏醒”了的东西在当时虽然只是在周作人与曹聚仁的私人通信中出现，并未公开发表，但它却由于有了“在香港”的曹聚仁而得以公开出来。于是，周作人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就他耳闻目睹的有限的范围内，他恢复了那种自卫的批判的意识与眼光。”¹⁹也从此，无法见容于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周作人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香港浮现、复活。但不像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周作人的思想在香港没有响应，他的这些意见就算是和曹聚仁在交流，他的自说自话和他的变化或许只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告慰吧。周作人在香港的复活和落寞在此后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1960年12月9日，曹聚仁根据他与《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的约定，自香港致信周作人，让他为香港的《新晚报》写稿²⁰，建议他“每月一万字，最好八九百字一篇。写得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应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新晚报》经济情况好，稿费一定有把握。罗兄（指《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雷按）答应十元一千字，这是写稿最高的。”“不要希望藏之名山，而且炒冷饭也不要紧，只要不太熟。”²¹周作人经过考虑，决定开始撰写大型回忆录著作《药堂谈往》（后改名为《知堂回想录》）。是年周作人76岁。经过断断续续的两年的写作，38万字的回想录完稿了。《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用曹聚仁的话说，“内容很丰富，‘诗’与‘真实’兼顾，乃是传世之作。只是阳春白雪，太高深了一点，尤其在香港。”²²但《新晚报》并未如原来所约刊载周作人的《回想录》，而是在拖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经不住曹聚仁的一再催促，才开始刊载。之所以会如此的原因，据罗孚后来的说法，一方面是怕它“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周作人“对敌伪时期的历史如何交代”。并且，在罗孚看来，周作人的回想录，“材料是丰富，但文章的光彩却已不如早年，这支笔到底老了。”即使如此，《回想录》在《新晚报》刊载了一个多月后亦遭“上命”“腰斩”，被中止刊载。²³于是，此后的经历似乎完全是在考验曹聚仁的耐性和他对朋友的忠诚。经过曹聚仁的多方联络和运作，《知堂回想录》中的部分章节前前后后地在《循环日报》、《明报月刊》、《新晚报》、《南洋商报》等报刊上发表。然后，他将这些文章的稿费积集起来，终于筹措到了这部书的排印费。1974年4月，历经坎坷的《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其时距周作人辞世已经多年了。

罗孚和他主持的《新晚报》当然有其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他既希望报纸不违“上命”，有一个他所理解的较高的“新文学”品味，但他更希望报纸有读者。当他请曹聚仁向周作人约稿，甚至当周作人完成书稿的时候，周作人发表文章的外部环境还不至太坏。当时，我宁愿相信罗孚犹豫的原因，不是由于他对周作人的文化价值缺乏了解，也不完全因为发周作人的文章过于敏感，而是因为周作人“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²⁴。在新文学史上写下过重要一页，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周作人居然到了没有读者的地步，香港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基础亦由此可想了。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没有看到像周作人那样的思想和文章在香港得到了怎样的回响。无论怎样，因为有了曹聚仁，有了香港的存在，周作人晚年的那些残余的思想，得以复活、重现，得以保存。他多了一个“拾芝麻”的地方，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他那支“到底老了”的笔也写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甚至，1961年，他的散文集《知堂乙酉文编》在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曹通信集》（二辑），诗集《儿童杂事诗》亦得以在

香港出版。很多年后,当周作人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沉渣泛起”、“重出江湖”的时候,它们的文学研究价值终于得到了体现。

晚年周作人的思想、文字能够在香港浮现、留存却又无根的现象,在雁来雁去的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天际,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延引他到香港的曹聚仁本人就同样如此,自1950年开始,移居香港二十多年,算的上是香港的“南来作家”了,但他那两部关于中国文学的重要著作<<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所倚重的材料和想法,主要就是依据他在大陆文坛和出版界的经历写成的,完全无意借重香港可能的材料,无视他的“香港作家”身份和对香港的影响。周作人本人从来没有踏上过香港的土地,他甚至与“南来作家”都粘不上边。这些情形都深刻地提示我们那些在思考“香港文学”问题时回避不了的问题:如何界定地域文学的特质,五四新文学和思想传统是不是当然就是我们讨论和衡量不同地域文学及其思想空间的标尺?

边缘、夹缝,“借来的”殖民地时空,迅猛突起的现代国际都市,使得全球/本土之间的冲突、现代都市的生活经验与个人体验、雅俗文化之间的转换关联,后殖民时代的性别书写等等成为新的意义发生场域,启蒙时代空泛的对自由、个性、科学等等的召唤并不是当然的召唤,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经简明扼要地指出过,“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既是一种要求读者理解,又可以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作品。”²⁵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看法,因此,香港文学要讨论的不是香港文学中有多少、怎样有了中国新文学的因素的问题,也不仅是通过对这种思考方式的反拨重提香港文学妾身未明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要展开这些地域文学怎样在该地域的社会文化过程中生长,放到在地的情景中处理在地的的问题,从而成就了怎样具有该地域特质的文学。

当我们撇开了文学上的大陆中心观念,摆脱了五四新文学的迷思,回过头来认真地思考香港文学的特质,看那六十年代前后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异军突起,欣赏那八九十年代蔚然成风的学者散文,看香港“仓颉”的造字书写,不是更香港也更“文学”的么!

参考文献:

- 1,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睿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2, 陈清侨 编, 《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3, 王宏志 著, 《历史的沉重: 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叙述》,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4, 王宏志: <<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 5, 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等著《否想香港》, 台北: 麦田出版公司 1997 年出版。
- 6, <<香港文学史>>, 潘亚暾、汪义生 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出版。
- 7, 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0 年出版。

注释:

- 1 黄子平:《害怕写作》, 第 17 页,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5 年出版。
- 2 这些成果主要有: <<香港文学史>>, 潘亚暾、汪义生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出版。此书凡 862 页, 65 万言。<<香港文学史>>, 刘登翰主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 4 月出版。该书亦有 759 页, 59 万字之巨。此二书都在后记或序言里明确指出是为 1997 年 7 月香港回归祖国之期, 作为一项成就为之献礼而撰写。<<香港文学观察>>, 许翼心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出版。
- 3 只要翻开任何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可以发现, 无论研究者们持怎样的文学史观, 怎样解释二

- 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五四都是他们必谈的话题，而且大多还要辟专门的章节来讨论。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唐韬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修订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 4 吕伦：《向水屋笔语》，第3页，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出版。
- 5 吕伦：《向水屋笔语》，第3页，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出版。
- 6 刘随：《鲁迅赴港演讲琐记》，载香港《文汇报》1981年9月26日第13版。
- 7 卢玮銮：《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三人谈》，载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第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
- 8 黄继持：《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三人谈》，载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第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
- 9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著《追迹香港文学》，第57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 10 在《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编选报告的三人谈中，他们就明确地说：“我们自觉运用了较严肃、谨慎的态度，”“我们事后回顾，比较了历史的走向，所以可能突出了一些有历史作用、具历史效应的材料；再者，我们在选择作品时，也会考虑到作品的可读性与艺术成分，所以我们也选择了一些自己认为较可取的作品。这个选集多少表现我们对香港文学的选择及淘汰。”而另一方面，郑树森先生更进一步说明了他们对于香港新文学历史分期依据：“早期”这个词是“萌芽”的意思，“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二七年二月鲁迅来香港演讲，对当时极守旧的香港文化界和文坛多少有点刺激，而白话文也大约在这个时期开始偶被部分报纸副刊接纳；而号称最早的新文学杂志《伴侣》是一九二八年创刊的，所以用一九二七年为起点。”这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建立香港文学背后的“五四新文学”背景。参见该书第4页。
- 11 黄子平：《害怕写作》，第33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
- 12 在香港的出版的各种报章、海报等媒介的书面写作中，仍常常会出现应口头流行而按照发音或象形而造出来的字词，其寿命依其形象生动实用的程度而生灭。
- 13 在我看来，只有到了抗战和战后，大批“南来作家”在香港找生活和工作以后，由于他们在香港社会比重的加大而产生的影响，香港才开始有了一点与中国新文学的趣味接近的基础。
- 14 参见唐韬：《关于周作人》，载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54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据唐的回忆，周作人曾给周恩来写信，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 15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第5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 16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19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出版。
- 17 参见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第827、82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
- 18 周作人早年在他的“五十自寿诗”中，曾有“未妨拍桌拾芝麻”的诗句，因而曹聚仁在与周作人的通信中，把周作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领取的先是一二百，后是四百元的固定稿酬戏称为“大饼”，而将他在海外赚取的稿费戏称为“拾芝麻”。参见《周曹通信集》，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1973年8月出版。
- 19 参见雷启立著：《苦境故事——周作人传》，285~28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 20 参见罗孚：《关于〈知堂回想录〉》，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246、25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 21 曹聚仁的来信见1982年10月《鲁迅研究资料》，第10期。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第882页。
- 22 陈思（即曹聚仁）：《一部书的传奇》，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190~19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 23 罗孚：《关于〈知堂回想录〉》，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247、25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罗孚的这个回忆同样还透漏了他和他当时主持的《新晚报》背后的书稿审查力量及其政治背景，表明当时香港文化界后面的多种复杂因子。
- 24 有些学者或会指出：六七十年代，司马长风等人的文学史类作品会在报纸连载，书出版之后能多次印刷，甚至被盗版，并没有“阳春白雪”之虑。但在我看来，那更多地是由于香港教育改革之后，对新文学的要求进入学校课堂，其读者多为学子，而不是一般读者。
- 25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文学理论》，李平译，第4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The new foreign literature ——observe the examp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old Zhou Zuoren

Lei Qi-l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bstract : In this paper, Zhou Zuoren old age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example, Hong Kong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last 20 years, Southern writers to research and write several different orientations of our literary history, that Several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values of our shared history of literature behind the writing is the same "external" new literary idea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nd literary writing o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certain identity, the "course" the presumption that dualistic thinking on the threshold of knowledge and the "center" and "to the center" to the conspiracy of our difficulties today.

Keywords : Hong Kong Literature, Old Zhou Zuoren, Identity ,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收稿日期: 2006 - 12 - 26

作者简介: 雷启立, 男, 1966 - , 湖北罗田人,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